

本书由砂华文协·天猛公拿督陈立训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砂拉越人文譯叢
1

砂拉越華人研究譯文集



蔡增聰 主編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出版



砂拉越華人研究譯文集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2003

本书由砂华文协·天猛公拿督陈立训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砂拉越华人研究译文集

主 编：蔡增聪

企 划：出版与翻译组

出 版：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6, 1st Floor, Lorong Tapang Timur 1,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Tel: 084-320767, Fax: 084-329259

印 刷：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 Sdn. Bhd. (99023-K)

32, Jalan Tapah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出版日期：2003年6月1日

版 次：1-400

订 价：RM1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3-9360-33-7

编者序

砂拉越华人研究，严格而言，乃发轫于二次大战之后。1953年田汝康氏英文本《砂拉越华人》之问世，开启了此研究领域的先河。随后，砂拉越华人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新的著述也陆续发表及出版。在历年发表的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中，中文的著述占了绝大部分，其作者群大部份为华人民间学者；在此类著述以外，另树一帜的是以英文撰作的著述，此类著述由于作者大多出身学院背景，著述的特点是善于利用档案资料，而且更重视学术写作的规范。以中文撰作的民间学者，著述一般较为华人文化界所熟知，他们当中如刘子政、刘伯奎及田英成等人，在砂华人研究界皆占有一席之地；其等著述亦经常为国内外华人研究工作者所引用。相较之下，以英文撰作的作者群，因著作多发表于学术刊物，流通不广，加以语言的隔阂，故大多不为砂拉越华人文化界所知悉。前期像田汝康、后起如麦克李(Michael Leigh)、卡列·洛卡(Craig A. Lockard)、李察·费德勒(Richard Filder)、周丹尼(Daniel Chew)等人，虽皆在砂华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然而，有机会阅读他们的著述的人，毕竟还不太多。

本译文集出版的目的，即是希望将后一类学者，过去在砂华人研究方面努力的成果，介绍给中文读者，以供作纯粹阅读或学术参考。这些研究著述被翻译成中文，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砂拉越华人研究之视野；同时在理论方法及观点上，亦或能提供借鉴之处。在著述的挑选上，我们首先考虑著述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及其在个别研究课题及时期上所具有的代表性；当然篇章的大小也列入考虑之内，基于译文集的篇幅所限，我们所选择的，基本上都是中

等篇幅的专文。

一本单薄的文集，当然无法将全部的成果罔罗殆尽，故此，我们仅将这本译文集的出版视为是一个起点，今后企盼能继续出版更多，包括专著在内的砂华人研究翻译作品。

译文集能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所有参与翻译的朋友，知情者都知道翻译是一桩费时耗力的工作；对于一位认真的翻译工作者尤能体会；难能可贵的是本文集的所有译者，都是义务承担这项工作，因此就更加令人感切心铭。除外，要感谢的还有论文的原作者，支持我们将著作译成中文，使更多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本书之出版，承蒙砂华文协·拿督陈立训出版基金资助全部印刷费，谨此申谢。

目录

编者序

- 〔1〕 砂拉越的华人 严建安译 /001
Lee Yong Leng, The Chinese in Sarawak (and Brunei)
- 〔2〕 查理士·布洛克与砂拉越现代华人社群
的基础 1863-1917 薛嘉元译 /024
Craig Lockard, Charles Brook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mmunity in Sarawak 1863-1917
- 〔3〕 1857 年砂拉越华工叛变：一个新的评价 蔡增聪译 /052
Craig Lockard, The 1857 Chinese Rebellion in Sarawak :
A Reappraisal
- 〔4〕 砂拉越华人：卅年的变迁 游思明译 /071
T'ien J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Thirty Year of Change
- 〔5〕 1947 至 1983 年砂拉越华人方言群体的组成与成长 黄纪邻译 /087
Joseph Ko Tee Hock,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Sarawak:
Composition and Growth between 1947 and 1983
- 〔6〕 新经济政策行之前砂拉越福州人商业力量的扩展 黄孟祚译 /103
Michael Leigh, The Spread of Foochow Commercial Power
Before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 〔7〕 撰写砂拉越华族历史的途径 黄国宝译 /117
Daniel Chew, Approaches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
- 〔8〕 砂拉越华族—土著的关系：一个历史的探析 许世韬译 /125
Daniel Chew, Chinese-Indigenous Relations in Sarawak: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砂拉越的华人

Lee Yong Leng 著
严建安 译

前言

除了人类学家之外¹，没有其他人曾对婆罗洲人口给予太大的注意。直到公布了前二三个户口调查报告前，那就是1947年(砂拉越和汶莱)1951(北婆罗洲)以及1960年(北婆，汶莱和砂拉越)的户口调查，对婆罗洲人口结构只有片断的认识。但是，最近事件的发生忽然间把婆罗洲区域推向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成立，不但使注意力放在婆罗洲不同部落的课题上，也使婆罗洲人口中最有文化及口齿伶俐的一族一华人，备受注目。

婆罗洲华人的早期历史

华人与婆罗洲之间的接触肯定至少发生在1500年前。虽然对这一段历史还是模糊不清，不过砂拉越博物院的发掘却为那些早期的接触提供可靠的证据。宋朝时期前(960-1279)，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华人对当时的汶莱有所影响。其实在公元600-1500年期间，在中国各朝代史籍中就有不少提到婆罗洲使节朝觐的记载²⁻³，虽然砂拉越博物院自1952年起在砂拉越西南部沿海地区的发掘工作，显示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早几个世纪华人主要是进行有季节性的居住期及贸易⁴。

这个华人年期与满者伯夷时代(Majapahit Era, 1300-1500AD)是有时间上的重复，并随著当时而来的是回教。

根据现有的证据，仍无法确知有关华人在15世纪前对这个地区的影响。然而在15世纪，当中国与汶莱之间进行著更多的贸易时，一些贸易团的成员毫无避免地选择在婆罗洲居留下去。汶莱和苏禄(Sulu)的年鉴中便有记载说在15世纪时有个华人殖民地设立在京那巴当干河(Kinabatangan River)；这可能是以那条河的命名作为纪念⁵。据说第二位汶莱苏丹，默哈默德(Sultan Mohammedan, 1435-1450)是跟京那巴当干河的华人拉者王三品(Ong Sum Ping)的女儿(或是姐妹)结婚而这是记载在汶莱拉者之《后裔书》(Selesilah)内⁶，华人纪录也提到婆罗洲有华人邦国(Chinese States)的存在或者在这期间最少也有华人的掌权者。尽管有许多华人神话与名称跟这个国家有牵连，这些早期华人的接触跟更早期与印度之间的接触一样，对今天的景观遗留下很少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及廿世纪的初期，华人定居的人数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及促成居住地的改变。哈里森(Harrison)总结得好，他说到：「可能现在跟以往一样，华人时代的主要影响是世俗的，艺术性及具有经济化的。肯定的是婆罗洲华人神话有讲到皇帝的儿子如何移走在京那巴鲁山(Mount Kinabulu)由火龙所保护著的金银财宝。」⁷

早期欧洲人有关婆罗洲华人的记载

要得到确实的文献资料，我们得去参考欧洲人的记录。最早期的欧洲人记录与明朝历史有重复的地方。虽然在地理上它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与华人本身有关社会与居住地方面的资料同样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比加菲达(Pigafetta)在1521年的书并没有提到华人社群但只讲到华人的丝绸，称秤物及硬币等；不过在另一方面这却显示出华人的影响⁸，汉德(Hunt)相信当葡萄牙人在1520年抵达时，他

们发觉到在婆罗洲的沿岸有很大数目的华人⁹。圣约翰(St. John)相信在初期与欧洲的交往中，一些华人「居留在汶莱并参予那些对他们有独特优越的工业领域。」¹⁰

虽然类似的讲话往往无法被确定，许多作者仍然会同意说汶莱与华人之间的贸易是持续性的进行著，而那种贸易不久便受因欧洲人的竞争受到影响。华人与欧洲人的贸易竞夺，尤其是与荷兰人及英国人的竞争是持续到18世纪。甚至在1776年，中国与汶莱之间的贸易是频繁的，很多中国的帆船经常出现在汶莱。有迹象证明，华人在汶莱建造帆船以及很多华人定居下来成为胡椒种植者及店员。¹¹

从十八世纪后开始，婆罗洲华人的居留活动多数是在婆罗洲西南部之金矿地带进行；那就是今天加里曼丹(Kalimantan, 印属婆罗洲)的「华人区域」。那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华人地区；有报导说那时「在荷兰人于1823年夺取婆罗洲西岸之前，每年有大约3,000名华人抵达成为垦拓者，但是移民到了现在已经是完全中止了。」当时计算中的华人是150,000名，其中90,000名是在金矿地区¹²。也有报导说，在1810年，有华人胡椒园在汶莱及北婆罗洲，同时当纳闽殖民地在1848年设立时，砂拉越第一省已经有大约一千名华人，并且他们也开始定居在北婆罗洲西岸之吧巴(Papar)。¹³

在十八世纪的最初廿年，在汶莱之40,000名华人当中的30,000位是胡椒种植者，他们已经减到1809年的15,000名。到了1847年，汶莱人口只剩下12,000人而华人已经不见踪影了¹⁴。从那时起，汶莱是在停顿著而没有华人被吸引去汶莱。在1911年有736位华人；到了1921年，是1,423人，以及在1931年，有2,683人。一直到了1931年之后才有更大数目的华人到油田去工作。¹⁵

十九世纪的华人移民

虽然华人在19世纪后涌入婆罗洲是与1800年中叶之后英国商业

企业化的需求有关；而需要有更多及乐于劳动的人加入，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布洛克家长似的统治下，砂拉越不像马来亚有大宗移民方式或是像北婆罗洲(沙巴)一样的开放。还有，不像华人大批移民到马来亚的情况，华人在开始时迁移到北婆罗洲主要是受到政府方面的支援，因它不像马来西亚有锡矿及树胶工业的引诱，足以刺激华族劳工的涌入或是石隆门(Bau)的金矿所造成荷属华人在1850年后期迁入砂拉越；甚至近 come (1931年到今天)当汶莱的石油工业的产量吸引到许多华人技术及半技术劳工的涌入而造成该地人口有加倍的增加。

在历史上的首个大宗华人移民到婆罗洲是在1850年代。当时有大数目的华人金矿工人及难民农夫从荷属婆罗洲迁移来(参阅后段有关他们逃离家园的原因)。他们穿越河流分界处到达石隆门地区并提供金矿及锑矿的劳动力。第二次大宗移民是在较后1880年代，它是由北婆的烟草公司及渣打公司(Chartered Company)所赞助的。新开发的烟草园丘几乎全靠华工，而他们是由新加坡及檳城的华工经纪人所带领的。但是一些种植者发觉到由于佣金，交通及其他费用过高，而促使他们选择直接从中国进口劳工。

除了矿工及烟草园丘之劳工之外，其他大部份的国内华人当时是经商及当店员。除了在砂拉越的几个胡椒园之外，他们之中很少是自动参予农业的，因为当时的国家是布满著茂密及生疏的森林而在缺乏经济援助下，华人是无法应付的。「抵达一个对他们来说是稀奇的新地，移民发现到他们要面对新的及陌生的困难。热带气候，原始森林以及达雅人的猎人头；新客(Sinkheh)无法适应任何一面。漂洋过海时在船上所得到的疾病只能在湿粘的气候下慢慢的复原，同时在食物短缺到需要拉者政府去提供粮食 几个粗劣的亚答屋便是居住的地方 。他们能够如此做到，是归因于他们倔强，有勇气及组织能力。个人是无法单独生存的，但是华人移民是受到守望相助的格外能量之拯救。」¹⁶

华人移民到砂拉越

在早年，砂拉越对华人移民有一定的需求。虽然砂拉越没有全部开放给大宗华人移民的到来，布洛克很清楚地看到华人将是他领土上的未来开拓者¹⁷。因为他相信可以借著外来人，尤其是华人，来巩固他本身¹⁸。1866年就是在1857年的华工起义所造成的诸多困扰之后，布洛克对华人还是有信心，并说道：「支那人(John Chinaman)身为一个民族，是一群优秀的家伙，那些东方国家缺乏他们有冲劲的存在将不会有好表现 但是坦白地说以及从双方面去看待，我急于跟一位东方的华族商人交往如同跟一位欧洲人 。」¹⁹

各界都同意说如果国家要发展，引进华工是需要的。这个政策一直维持到1920年代及1930年，当有更大群的移民开始从新加坡及中国前来加强早期开拓者的人数。移民受到约束，尤其在经济萧条时期，导致很多华人得被遣送回国。「在1931年失业及相关的问题已发展到无可避免的严峻地步，明显的，应付这个情况的最经济作法便是把那些因年龄及健康状况已经使他们无法找到工作的华人遣送回国。²⁰」其实在这些年里，回国的人数超过移民人数²¹，在这种管治移民制度下，除非得到自己族群的担保，没有男性移民会被允许进入砂拉越。这要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情况才开始改善。到了1935年，移民又再次多过外移人数了。

华人移民及外移 - 古晋及诗巫，1930及1932

年 份	移民	外移	外移／移民	
1930	5,399	9,329	3,930	男
	1,529	1,351	178	女
1931	3,155	6,029	2,874	男
	1,020	1,564	544	女
1935	8,830	5,170	3,660	
1936	8,955	6,370	2,585	
1937	14,108	6,982	7,126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移民停顿了下来。大战后，当政治形式要求不同的政策去对付华人的到来时，移民限制受到更大的紧缩。当然，这个政策跟早些时候的英国行政人员的看法是相左的。这可以从圣约翰(ST. JOHN)的话总结：「只有一个民族可以开发东方群岛而他们就是华人。他们是最勤劳及节俭的一族，他们对家室却很开放以及在个人开销方面却无拘束。他们是唯一可以支撑欧洲政府的族群，因为他们将是唯一能付还可观的税收的亚洲人。」²²

古晋区的华人

其中第一批在近代时期抵达婆罗洲的是百多位于1772年在坤甸(Pontianak, 荷属婆罗洲)登陆的客家人。他们形成了荷属婆罗洲后期华人在组织「公司」制度(Kongsi)的核心人物，以及他们的发展历史跟他们与陆达雅民族之间的麻烦与荷兰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早在上一世纪的开始，便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华人组织从蒙特拉都(Montrado)扩展²³。克罗富德(Crawfurd)在1820年的报告中提起有32,000名男仕及4,000名妇女在十三间大的和五十七间小的矿场工作；他描述一幅兴隆的金矿场情况，主要是出口到孟加拉(Bengal)和中国。²⁴

但是华人与荷兰人之间的争执加剧，税务的增加，荷兰惩罚性的征伐行动的加重，这些「主要是成功地打击到小型聚居地，采矿工人感到沮丧并且造成越来越多的移民向西部的砂拉越涌入。²⁵」在荷兰的持续压力下，从1839年的20,000华人，在往西部迁移的浪潮下，这个人数是在减少中，但是「公司」被完全废除是在1857年的事件后，华人因而完全被征服。波斯威(Posewitz)报导说：「持久性的战争把原本是兴隆的金矿工业瓦解了；成千勤劳的工人不是被杀害便是受驱散；同时没有新的工人抵达来代替他们。²⁶」今天，原是兴隆的金矿开采业市镇(例如蒙特拉都)只能从开采金矿的痕迹中找到，它的规模达到甚至多年后，森林还是无法遮盖它的程度。

在砂拉越，华人在荷属婆罗洲及砂拉越之间往返，在十九世纪时便频繁许多，而到了1842年，圣约翰(St. John)形容在石隆门(Bau)四周的华人人数为「令人感到头痛」²⁷。然而要到了1850年才有大批的华人从边界经过石隆门进入砂拉越。同年，大约有3,000名华人从荷属婆罗洲的邦戛(Pemangkat)来；他们没有参予起义去反抗荷兰人，可是为了避免因自己同胞参予反抗而带来的愤怒，他们得逃避到砂拉越去²⁸。这些难民主要是稻农，但是他们的困境除了居留在砂拉越上游的矿业群体中，如设在石隆门，毕地(Bidi)，巴谷(Paku)以及短廊(Tundong)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全部是组织在一个「公司」—三条沟之下，它们总部是设在石隆门并且是过去及现今的主要内陆乡村。除了这些矿业群体之外，当时在砂拉越还有在新尧湾(Siniawang)及实哥邦(Segobang)的华人务农者，他们过后被拖进在1857年的华人矿工起义的事件中。

邦戛的华人涌入砂拉越上游为寻找金矿而带来极大的动力并造成新的水库，堤坝及水沟所形成的陆上景象。由于难民是农夫，他们对采金矿没有太大的兴趣。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本身很想去安顿这些华人使到他们可以去务农。虽然在摩拉德峇(Muara Tebas)的实金甲(Sejinkat)以及山都望山脚(Santubong)的初时居留地有作出努力，基于行政及监督上的差劲，它们得被放弃。邦戛的华人却不灰心，他们一直都在申请援助要务农；最后有几百名在离开古晋六哩处的双溪登雅(Sungei Tengah)定居下来²⁹。圣约翰的记载说到了1855年，它有500名盛旺人口，他们以种稻及蔬菜为活，同时他说：「他在婆罗洲从来没有看到比如此广阔的耕种田芭散布在华人住家周围更为美观，同时每一个住家都被青葱的菜圃所包围著。」³⁰

从这里往上(那就是沿著砂拉越河的上流)直到新尧湾就不会见到其他的华人居住地，同时从新尧湾到石隆门之间到处都有开采金矿的痕迹。据1857年的估计，在起义前，约有4,000名华人在矿场内，而在古晋则只有500人。这个人数在1854年及1856年，当华人一批

批的从荷属婆罗洲的涌入而告增加。石隆门当时是一个大村庄，它拥有一百间的商店和许多住家³¹。同时这间「公司」与三发(Sambas)的荷兰华人之间的往来是很频繁的；因华人在边界建造了陆路而使到这种移动更为利便。

矿区内的垦拓移民之间的关系都形成了相当紧密的一群；他们之中多数不是有同宗的关系就是从中国的同个地方来的。一个小聚落的人可能是从同样的地区来的而他们通常是同宗的。大多数的男人是金矿工人，因此垦场地区不仅仅是邻舍罢了。³²

所以这个简要的迁移历史，可用来说明在砂拉越第一省为何有以客家为主的强大华人的存在。从荷兰领土的陆路移民以及从中国以航海来的移民都在进一步的延续著。许多原本要跟他们在西婆罗洲的亲属及邻居们会合的都选择去了砂拉越。

诗巫区的华人

砂拉越的另一个有大量华人集中的地区是在诗巫以及第三省拉让江下游地区。他们是在后期才来的，因此没有一个聚居地的历史是超过六十年的。

1900年，一位叫黄乃裳的知道查尔士布洛克(Charles Brooke)有计划引进有经验的农夫来砂拉越居住。他因此与拉者商讨并从他的家乡福州县区成功地带进第一批有七十二位的移民。³³

新珠山(New Pearl Hill)，一个靠近现有的诗巫市的地方被选为他的行动据点。县长在河的西岸建造了六间茅屋以及二间在东岸来应付移民的到来³⁴。这个据点被称为「新福州」；从它简陋的开始并且发展成为今天规模相当大以及人口稠密的福州人聚居地。

1901年另一批500人抵达诗巫，以及在1902年还有540位加入³⁵。所有这些移民都面对初期的困难；只有他们的坚持及勇气方能挨过去。他们的首领黄乃裳在1906年放弃他的职位而由一位美国卫理传

教士富雅各(James Hoover)接替，并带垦拓者渡过多个艰难的时期。在他的主动下，移民们种植了树胶。由于胶价兴旺，侨居者也跟著发达起来了。在这段时期(1914-1918年)有更多的移民与他们在新福州的亲属及朋友会合。这使到现有的土地在扩大并要去开发新的地区；垦拓区在拉让江两岸的十个地方设立了起来。但是经济萧条带来另一个困苦的时期，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把他们的土地抵押作为支付新的土地开发之用。可幸的是，富雅各设法拿到一项政府贷款来渡过他们暂时性财务上的困境。

1924年，当树胶价格又上涨时，另一个扩展时期开始了。福州籍农民「竞相购买胶园或是向土地局申请几十到几百依甲的地，同时投资数额从几千到几十千元。³⁶」

那些从事杂货及其他消费品的公司被设立了起来；一些去组织木板厂，米较，胶较以及轮船公司。这是诗巫的繁荣时候；一大部份的福州垦拓者在这段时间走向城市化，使到诗巫的成长已变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河流港口市镇了。这种从早期农业的转变到经商，使到诗巫成为砂拉越唯一市镇内的职业，仍然是操在福州人的手中，并且福建人及潮洲人想要侵占这个领域却还未成功做到。

新福州趋向繁荣却因1928年的一场大火把整个市镇烧成烟灰而使它几乎完全停顿了下来。过后到了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这个先驱地进入另一个的困苦时期并且加剧人民的悲惨生活情况。政府通过公共工程计划的援助对情况是有稍微的改善。从垦拓者的角度来看，这场大火对诗巫的成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到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市镇，诗巫却只有区区的卅多年的历史罢了。

然而，从诗巫的这个核心地区，垦场者已经向外发展到民那丹，泗里街，民都鲁以及峇南(马鲁帝)，他们多数是福州人。「新福州」这个名词不止用在诗巫罢了；它包括所有在砂拉越有福州人的居留区。从一小片森林地只供种植红薯及蔬菜，华人已经在森林里设立起许多树胶及胡椒园而它们形成这地区的主要景色。虽然他们有向

外发展并开拓新的地区，但是最大的福州人集中点仍然是在他们进入国家的地区。因此，集中在诗巫的一群华人移民，他们的到来，职业以及方言跟第一省其他主要的华人社群有所不同。后者的引进多数是从陆路荷属婆罗洲的三发县来的以及他们与蒙特拉都-三发-石隆门(Montrado-Sambas-Bau)的金矿开采活动有关系，而前者务农者才直接从中国移民而来的。

人口数字及其成长

在历史性时刻，华人移民开始有数量上的增进并移居在砂拉越只是在 1850 年代的事。

今天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无论如何，在早期的移民岁月期间，当这个国家有不多的华人妇女时，华人与原住民通婚的事件是有相当的数字。就是早在 1839 年，詹姆士·布洛克认为「华人与马来人的混合遗传，应该是有相貌以及勤劳的一族，他们只会比原住民有更多的华人品格」，并且他相信说：「他们是是值得注意并会成为国家未来持有者的族群。³⁷」像马来亚的峇峇(Babas)，他们可能会在文化及民族意识方面以一种折衷的形式出现。

就是到 1947 年，诺亚(Noakes)在他的 1947 年户口调查中提到，「男性多过女性的自然后果是造成与土著通婚是相当多的，它们通常是发生在郊区的华人男性农民与海达雅及陆达雅妇女间的结合。这种婚姻的后裔往往是采纳父亲性格以及被接纳为华人。这造成土著人口自然增加处于停顿的结果，而华人却在快速的增加著。」³⁸

但是两性之间的比例到了 1960 年得以改善而达到 904(1947 年是 783)并且 79% 的华人是在砂拉越诞生的。有各种迹象显示华人在今天是更加稳定地居住的一群，因而在未来异族通婚，除了那些居住在遥远内地的华人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今天华族人口是 229,154 人，相等于砂拉越总人口的 30.8 巴仙。

他们不只是最大的移民族群，同时，如果每个原住民是以个别及明显的族群来区分的话，华人也是砂拉越的第二大族群。在早年他们的增加是基于移民人数但现在的高成长率是自然增加的。在1947年与1960年之间，全体原住民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各自原住民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是在减少。可是华人的比例却从26.6巴仙增加到30.8巴仙。其实，在过去五十年，原住民的比例都在减少中而华人却在逐步增加著。

砂拉越华族人口的成长

年 份	人 数	增 加	增加的巴仙率
1841	1,000	--	--
1871	3,467	--	--
1876	2,742	--	--
1909	45,000	--	--
1939	123,626	78,626	--
1947	145,158	21,532	17.4
1960	229,154	85,996	57.9

如果华人每年成长率为3.5巴仙是一个标准，无可避免地会看到华族人口比例在下次的户口调查中将会是更高的。在上次户口调查期间，华人成长多过(57.9巴仙)全国平均增长率(36.3巴仙)。同时，原住民人口在各个情况下的增加率是低过全国的平均(28.3巴仙)。

不同族群的生育比例也可以提供一些未来成长的指示。华人比例到达900.6比砂拉越的平均在755.4是高出了许多。同时除了陆达雅族之外，其他各自的土著在所有情况下都低过全国的平均。

年龄形金字塔也显示出刚好超过一半的华人是在15岁之下。如同其他族群，虽然年轻人的比数是很大的；多数华人年龄是介于5-14岁之间的儿童；还有一点，华人儿童的夭折率是较低的。那些年